

伊斯兰与中东政治

当代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化探析^{*}

李福泉

摘 要: 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东什叶派乌里玛曾在伊朗烟草抗议事件、伊朗立宪运动和伊拉克反英斗争三大事件中表现出空前的政治热情。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因受到世俗化冲击下的宗教危机、乌里玛自身生存危机和日益严重的教派政治危机的影响,什叶派乌里玛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伊拉克两大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是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化的源头,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通过“纳杰夫网络”和设拉子派实现了政治化。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化产生了多重影响。

关键词: 阿拉伯什叶派; 乌里玛; 政治化 “纳杰夫网络”; 设拉子派

作者简介: 李福泉,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西安710069)。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6)03-0003-1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在伊拉克和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乌里玛(ulama,又译乌勒玛、欧莱玛等)是现代什叶派政治的核心角色。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乌里玛这一阶层,便无法理解阿拉伯什叶派的政治发展进程。但是,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普遍参与政治并非久已有之,而是一种现代现象。长期以来,什叶派乌里玛在政治上奉行无为主义(quietism),固守远离政治的传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曾积极参与政治,但因缺乏足够的宗教思想的支撑,导致其政治参与缺乏持续性。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什叶派宗教政治思想取得突破性进展,乌里玛才真正开始政治化,实现由传统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当代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11XSS004)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等资助项目“什叶派乌里玛与现代伊朗政治研究”(2014M560749)的阶段性成果。

知识精英向现代政治精英的转变,成为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中的关键力量。^①

总体而言,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本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什叶派社会普遍政治化的结果与反映。正如亨廷顿所言,在现代化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各种社会势力都积极参与政治,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性。^② 社会结构的变动、思想观念的革新、政治制度的变化,以及利益关系的调整,都成为促进社会势力政治化的重要因素。作为阿拉伯什叶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乌里玛既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又往往充当普通什叶派群体的利益代表。乌里玛的政治化是阿拉伯什叶派社会剧变的集中体现。

一、中东什叶派乌里玛的早期政治化

什叶派具有明显的跨国特征,而伊朗又是中东什叶派的中心,因此研究阿拉伯乌里玛的政治化必须结合对伊朗乌里玛的分析。历史上,阿拉伯乌里玛与伊朗乌里玛关系密切,并深受后者影响。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中东什叶派乌里玛曾在三大事件上表现出空前的政治热情。从历史角度看,这三大事件是 20 世纪中东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化的开端。

第一,1890 至 1892 年的伊朗烟草抗议事件。1890 年,伊朗国王纳绥尔丁将本国的烟草专卖权转让给英国商人塔尔伯特,引发伊朗国内商人的激烈抗议,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的乌里玛也对此进行声援。当时声望最高的大阿亚图拉米尔扎·哈桑·设拉子给国王写信和发电报,要求收回专卖权。国王不听劝告,导致米尔扎颁布法特瓦(宗教法令),宣布消费烟草非法。^③ 伊朗民众纷纷响应,烟草商人关门,烟民不再吸烟,直接使烟草专卖权丧失了价值。国王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收回烟草专卖权。这是什叶派乌里玛与世俗王权的一次公开对抗,它进一步确立了什叶派乌里玛代表人民反对国王专制和外来侵略的地位。

第二,1905 至 1911 年的伊朗立宪运动。立宪运动既是以反对君主专制为目标、规模空前的政治运动,也是伊朗乌里玛宗教力量与世俗王权之间爆发的一次大冲

^① 目前,国内学术界缺乏对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的宏观研究,关注的是穆萨·萨德尔、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和法德拉拉等个别乌里玛。相关论著包括:王宇洁《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吴冰冰《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李福泉《黎巴嫩什叶派理论家法德拉拉及其思想》,载《西亚非洲》2011 年第 3 期;李鹏涛《穆罕默德·巴基·萨德尔与伊朗伊斯兰体制的创建》,载《西亚非洲》2007 年第 2 期;吴冰冰《穆萨·萨德尔与黎什叶派》,载《阿拉伯世界》2003 年第 5 期。

^② 参见[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版,第 162 页。

^③ Heinz Halm, *Shi'ism*, Janet Watson, tra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14.

突。伊朗和伊拉克许多什叶派乌里玛参与了整个过程,在这场运动中表现活跃。他们积极支持立宪运动,谴责国王的专权行为。阿亚图拉穆罕默德·侯赛因·纳伊尼(Muhammad Husayn Naini)撰写论著,在乌里玛中首次阐述立宪思想,对立宪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①立宪运动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就乌里玛与其他社会阶层联合反对专制王权的行动而言,它是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先声。

第三,1914至1923年的伊拉克反英斗争。奥斯曼帝国时期,什叶派在帝国统治区域内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什叶派乌里玛无法干预这个逊尼派帝国的事务。1914年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迅速解体,伊拉克发生了空前的政治剧变。伊拉克地区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什叶派乌里玛一改以往的态度,开始积极介入当地事务。当年11月,英军攻入伊拉克南部地区后,什叶派乌里玛颁布法特瓦,宣布对英军发动“圣战”。当英军完全占领伊拉克后,什叶派乌里玛积极表达意愿,试图影响乃至主导伊拉克政治进程。1920年,什叶派乌里玛发起全民大起义,与英国殖民者形成直接对抗的局面。到1923年,在英国和伊拉克政府的合谋打击下,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参与遭到压制,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被彻底边缘化。

上述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参与是中东社会新旧交接之际乌里玛政治意识初步觉醒的表现,西方殖民侵略是其重要的背景和动因。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殖民国家的步步紧逼使中东什叶派倍感压力,自视为伊玛目代表的乌里玛自然无法置身事外。“异教徒”对穆斯林土地的侵略促使乌里玛充当起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无论是烟草事件,还是反英起义,都是什叶派乌里玛领导广大什叶派民众反击殖民者的标志性行动。随着“西风东渐”,什叶派社会受到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乌里玛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伊拉克圣城和伊朗的部分什叶派乌里玛参与反对王权的立宪运动正是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

总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东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态度已经出现重要转变。但由于当时中东现代化的大幕刚刚拉开,什叶派社会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什叶派乌里玛还没有受到现代化的巨大冲击,他们的宗教政治思想尚未实现现代转型,其政治参与也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因此在这一时期,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活动缺乏持久性。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伊朗和伊拉克等国世俗政权的日渐巩固,什叶派乌里玛又重新恢复到无为主义的政治状态。此后的30多年里,绝大多数什叶派乌里玛都超脱于政治活动之外,尤其是那些阿亚图拉级别的乌里玛更是如此。当时在伊朗,即便乌里玛表达政治立场,也往往是站在世俗王权一边,这与日后霍梅尼坚决反对国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49年,当时的“最高效仿源泉”赛义德·侯赛因·

^① 关于纳伊尼思想的研究,参见 Abdul-Hadi Hairi, *Shi'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Iran: A Stud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Persian Residents of Iraq in Iranian Politics*, Leiden: Brill, 1977。

塔巴塔巴伊·布鲁杰尔迪(Seyyed Hossein Tabatabai Borujerdi, 1875 ~ 1961)邀请各地约 2 000 名什叶派乌里玛到库姆开会,要求他们不得加入政党和干预政治事务。^①布鲁杰尔迪拥有当时无人可比的宗教声望,他的主张对中东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任何什叶派宗教学者想要涉入政治活动,都不能不考虑布鲁杰尔迪的立场。

二、当代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化的原因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化经历了重大转变。许多什叶派乌里玛开始积极投身政治运动,1958 年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建立伊拉克达瓦党,1959 年穆萨·萨德尔进入黎巴嫩和 1963 年霍梅尼发动反对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成为这种转变的三大标志性事件。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化和阿拉伯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的兴起并非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影响的产物,它们具有自身独立的发展逻辑。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积极参与政治,成为延续至今的重要政治现象。伴随二战后现代化进程在阿拉伯国家迅速推进,乌里玛与阿拉伯什叶派社会遭遇多重危机,构成了乌里玛政治化的重要原因。

首先,世俗化冲击下的宗教危机。二战后,阿拉伯各国步入了快速现代化的轨道,世俗主义思潮在阿拉伯国家迅猛传播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令伊斯兰教遭遇空前挑战,处于明显的守势。无论对国家政治,还是对穆斯林思想文化的影响程度,伊斯兰教早已丧失了原先的绝对优势地位。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以世俗民族主义为指导构建国家。各国世俗政权推行世俗化政策,逐步挤压着伊斯兰教的空间。伊斯兰教因被许多人视为保守和落后的力量而面临空前压力。共产主义等左派思想打出平等的旗帜,对遭受歧视的阿拉伯什叶派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在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伊拉克和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成为共产党的主要组成部分。共产主义对什叶派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使其远离了伊斯兰教传统。

伊斯兰教的衰落使得乌里玛阶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出于一种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感,乌里玛开始阅读西方著作,对各种世俗思想尤其是共产主义进行批判。他们建立政党或协会,阐释和宣传伊斯兰教,如伊拉克达瓦党建立初期的直接目标就是对抗共产主义的传播。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撰写论著,既反击资本主义,又批判共产主义,试图为穆斯林社会找到替代的发展道路。

其次,乌里玛自身的生存危机。伊斯兰教是乌里玛的安身立命之所,乌里玛的

^① Shahrough Akhavi,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Iran: Clergy-State Relations in the Pahlavi Perio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0, p. 63.

荣誉和地位与伊斯兰教须臾不可分离,伊斯兰教的衰落必然对整个乌里玛阶层的生存构成直接威胁。世俗化的冲击令人们的宗教意识逐渐淡薄,乌里玛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他们甚至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穆斯林大众的普遍尊重。在传统什叶派社会,宗教几乎是教育的全部内容,乌里玛是传授神圣知识的教师。但现代世俗教育的快速发展,不仅使宗教在教育中的地位被边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乌里玛数百年来所主宰的教育权。乌里玛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拥有者。^① 这些不利因素的必然结果是,乌里玛的收入日益减少,远离信仰的穆斯林不再向他们缴纳宗教课税。对于成年什叶派穆斯林而言,缴纳胡姆斯(Khums)^②和天课是宗教义务,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愿行为,因为即便是地位尊崇的大阿亚图拉也不可能通过强制性手段要求穆斯林履行宗教义务。

收入的减少对于年轻的乌里玛影响更大,这正是他们积极倡导宗教复兴的一大原因。经济的困难、地位的下降以及政府的有意打压,导致乌里玛的队伍日益缩小。在传统社会,从谋生角度和社会地位来看,宗教学者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宗教知识的“贬值”,接受世俗教育被下层子弟视为改变命运的首要选择,乌里玛的身份越来越丧失价值和吸引力。在纳杰夫这个传统的什叶派宗教教育中心,宗教学生数量锐减。20世纪初,纳杰夫的宗教学生数量多达8,000人,但到1957年只剩1,954人。^③ 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许多什叶派乌里玛家族的子弟、年轻的乌里玛或宗教学生甚至抛弃宗教生涯,加入共产党,或者成为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侯赛因·穆鲁瓦(Husayn Muruwwa)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④ 1910年,穆鲁瓦出生于黎巴嫩的一个乌里玛家庭,14岁时奉父命到纳杰夫经学院接受宗教教育。1938年,穆鲁瓦获得伊加扎(证书),具备了成为宗教学者的资格。此后,像许多宗教学生一样,他先后阅读了圣城内流传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文献,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1949年,他因从事政治活动被迫返回黎巴嫩,两年后加入当地共产党。自1964年至1987年逝世,穆鲁瓦一直是黎巴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乌里玛队伍的缩小和后备人才的流失对整个乌里玛阶层形成巨大震动。因此二战后,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乌里玛,都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乌里玛为求得生存,不得不作出适时的回应,除理论创新和宗教宣传外,从事政治活动开始成为

^① Silvia Naef, “Shi’i-shuyui or: How to Become a Communist in a Holy City,” in Rainer Brunner and Werner Ende, eds., *The Twelver Shia in Modern Times: Religious Culture and Political Culture*, Leiden: Brill, 2001, p. 266.

^② 胡姆斯(Khums),即五一税,是什叶派的特殊传统,它要求什叶派穆斯林在缴纳天课外另需缴纳的宗教税。

^③ Yitzhak Nakash, *The Shi’is of Iraq*,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54, 259.

^④ 参见 Silvia Naef, “Shi’i-shuyui or: How to Become a Communist in a Holy City,” pp. 256, 261-263.

许多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的共同选择。

最后,日益严重的教派政治危机。穆斯林大众的支持是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生活的主要依靠。在伊朗,什叶派宗教界曾得到世俗王权的大量馈赠,但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则不可能得到逊尼派奥斯曼帝国的恩惠。当奥斯曼帝国崩溃后,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乌里玛更不可能像逊尼派乌里玛那样得到政府的经济支持。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与穆斯林大众之间的经济关系决定了前者要自觉地反映后者的意愿,保护后者的利益。此外,乌里玛作为伊玛目在世间的合法代表,意味着他们领导穆斯林具有道义层面的优势,同时也是他们的宗教义务,而二战后日趋严重的教派政治危机促使什叶派乌里玛终于肩负起了领导的使命。

一战后,黎巴嫩、伊拉克等现代阿拉伯国家建立。在新的政治体系中,阿拉伯什叶派延续了其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政治边缘地位。逊尼派(在黎巴嫩还包括基督教马龙派)主导下的国家权力扩张挤压着什叶派的生存空间,政治争夺和经济竞争使得教派关系日趋紧张。与此同时,现代思想的传播使得什叶派的权利意识普遍增强,成为什叶派争取平等权益的内在动力。由此,追求教派利益的什叶派政治运动成为阿拉伯国家社会政治变化的重要表现,什叶派乌里玛投入政治活动正是对这一形势的回应,而他们的政治化又大大增强了阿拉伯什叶派政治运动的教派特征。1959年,正是由于同情黎巴嫩什叶派的处境,穆萨·萨德尔来到黎巴嫩,并在当地发起了什叶派政治运动。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于1958年组建的伊拉克达瓦党初期具有泛伊斯兰的特征,但复兴党政权的镇压及其对什叶派的排挤使得达瓦党转变为纯粹的什叶派政党。

总之,随着阿拉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什叶派乌里玛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既在复兴衰落的宗教,也在维护乌里玛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在捍卫阿拉伯国家什叶派应得的权益。对于乌里玛而言,这三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

三、当代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化的途径

从历史角度看,伊拉克的两大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是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化的源头,尤其是纳杰夫,不仅是什叶派宗教政治变革思想的发源地,也是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接受政治培训的基地”。伊拉克什叶派宗教界的政治化以圣城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形成辐射,并对其他阿拉伯国家什叶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圣城内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乌里玛或宗教学生实现政治化后回国,成为当地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的骨干和领导人。在黎巴嫩,纳杰夫的影响总体上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在沙特、科威特和巴林三国,纳杰夫和发源于卡尔巴拉的设拉子派在当地均有影响,并处

于彼此竞争的状态。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化通过“纳杰夫网络”和设拉子派实现了其政治化。

（一）纳杰夫网络

纳杰夫网络是指因效仿纳杰夫的大阿亚图拉和在纳杰夫求学而形成的遍布什叶派世界的师生、同学以及效仿者与被效仿者之间的关系网。纳杰夫不仅是大阿亚图拉的传统驻地 and 什叶派的拜谒地,也是首屈一指的什叶派宗教教育中心。有学者指出,“什叶派本质上具有国际性,因为它不承认边界。”^①各地什叶派学子源源不断地赴纳杰夫接受教育,不仅保证了什叶派宗教思想的跨国传播,也建立了圣城与各地什叶派联系的桥梁。此外,各地什叶派拜谒圣城和效仿圣城内大阿亚图拉的热情,也加强了纳杰夫与各地什叶派之间的固定联系。事实证明,纳杰夫网络对伊拉克之外阿拉伯什叶派的政治化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宗教角度看,纳杰夫是阿拉伯什叶派的中心,而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处于边缘。历史上,什叶派宗教思想的传播大体呈现由中心到边缘的态势,现代什叶派宗教政治思想的散布也遵循相似的路径。现代伊拉克建国后,变革的潮流在纳杰夫逐步显现,什叶派宗教界不得不回应外部挑战。1935年,著名什叶派宗教学者里达·穆扎法尔(Rida al-Muzaffar)在纳杰夫建立了一所新式宗教学校,学校的教法系既开设教法原则等宗教课程,也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和英语等现代课程,教师既有传统的乌里玛,也有接受了世俗高等教育的博士。^②这所宗教学校开阔了部分什叶派年轻人的视野,培养了一批具有革新思维的学生,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什叶派反政府组织的成员。学校里的学生包括许多纳杰夫和黎巴嫩乌里玛的子弟,如侯赛因·法德拉拉就曾在这所学校就读。^③除了新式教育的发展,源自西方的社科著作也在纳杰夫广泛流传,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年轻乌里玛和宗教学生的内心形成巨大冲击。宗教思想开始冲破传统的束缚,努力适应现代化发展。作为追求活力和自由的象征,诗歌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受到年轻乌里玛和宗教学生的青睐,侯赛因·法德拉拉就曾以擅于作诗闻名纳杰夫。^④

1958年底,达瓦党的建立成为纳杰夫宗教思想经历重大变革的标志性事件,年

① Chibli Mallat, "Iran, Shi'ism, and the Arab Middle East," in Makoto Mizutani, ed., *The Middle East into the 21 Century*, Reading: Garnet Publishing Limited, 1996, p. 149.

② Yitzhak Nakash, *The Shi'is of Iraq*, pp. 267-268.

③ Sabrina Mervin, "The Clerics of Jabal Amil and the Reform of Religious Teaching in Najaf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n Rainer Brunner and Werner Ende, eds., *The Twelver Shia in Modern Times: Religious Culture and Political Culture*, Leiden: Brill, 2001, p. 83.

④ Martin Kramer, "The Oracle of Hizballah: Seyyid Muhammad Husayn Fadlallah," in R. Scott Appleby, ed., *Spokesmen for the Despised: Fundamentalist Leaders in the Middle E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 80.

轻的宗教学者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是该党的核心和灵魂人物。萨德尔不仅直接参与了达瓦党的创建,还充当了达瓦党理论家的角色。达瓦党是当时在纳杰夫生活和求学的阿拉伯各国年轻乌里玛和宗教学生交流的主要平台,其中既有伊拉克什叶派,也有来自黎巴嫩、科威特和沙特等国的年轻人,一些乌里玛虽不是达瓦党党员,但在复兴伊斯兰教方面仍志同道合、殊途同归。纳杰夫乌里玛开办报刊,撰写论著,积极宣传伊斯兰教;达瓦党还开展秘密活动,招募成员,逐步成长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来自黎巴嫩的法德拉拉和沙姆斯丁虽未加入达瓦党,却是乌里玛协会的成员,并积极投身宗教宣传活动。以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为代表的年轻乌里玛成为纳杰夫宗教界首要的变革力量,构成了第一代政治化的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他们彼此互为同学,年龄均在 20 岁左右,都主张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20 世纪 60 年代初,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退出达瓦党,专心著述和讲学,许多纳杰夫的年轻学子接受了他的思想,成为其热情的追随者,他们是第二代政治化的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化的乌里玛不仅是宗教导师,也是关注现实的政治行动者。在纳杰夫,他们接受了现代宗教政治思想的熏陶,具备了宣传和动员的技巧。值得注意的是,1965 至 1978 年,霍梅尼也曾在纳杰夫活动,他著名的“法基赫的监护”^①思想正是在纳杰夫形成的。因此,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纳杰夫是整个什叶派世界酝酿伊斯兰革命思想的中心。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伊拉克复兴党的镇压和政府对于纳杰夫经学院的限制,阿拉伯各国乌里玛或宗教学生几乎全都离开了伊拉克。达瓦党党员的逃亡也把这一组织带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他们回到祖国后担负起领导当地什叶派的责任,纳杰夫留学生的身份使他们比那些曾到西方留学的高学历知识分子更加受人尊重,一些世俗人士也试图有所作为,但他们大多无法与乌里玛在什叶派中进行政治竞争。^②

乌里玛在不同国家以不同形式动员什叶派,这成为当地什叶派政治运动兴起的外部推动力量。总体而言,纳杰夫对除伊拉克之外的黎巴嫩什叶派影响最大。当代黎巴嫩最具影响的 6 位乌里玛都曾在纳杰夫生活或学习过。1959 年穆萨·萨德尔在前往黎巴嫩前曾在纳杰夫学习 4 年,侯赛因·法德拉拉和马赫迪·沙姆斯丁都在纳杰夫出生,直到 30 多岁才离开伊拉克,三人都是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的同学,属于第一代政治化的乌里玛。苏步希·图费利、阿巴斯·穆萨维和哈桑·纳斯鲁拉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前三任总书记,他们都曾在纳杰夫学习过,是穆罕默德·巴

^① “法基赫的监护”(Wilayat al-Faqih),又译“教法学家的监护”或“教法学家的统治”。霍梅尼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中确定并批准“教法学家监护”原则时指出“教法学家监护是指由教法学家(法基赫)对所有的国家机构进行监督以避免一些事物偏离轨道”。参见王振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制度研究(1979—2012 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版,第 24—33 页。

^② Laurence Louer, *Transnational Shia Politics: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Networks in the Gul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79-281.

基尔·萨德尔的学生,属于第二代政治化的乌里玛。在巴林,两个最重要的乌里玛伊萨·卡赛姆和埃米尔·贾姆利同样都有在纳杰夫求学的经历,沙特什叶派首要领导人哈萨·萨法尔虽然受设拉子派的影响更大,但也曾在纳杰夫短期求学(见表1)。除了上述重要的乌里玛外,纳杰夫乌里玛还通过达瓦党对其他阿拉伯国家什叶派施加影响。达瓦党的黎巴嫩党员回到国内后,初期形成支部,后来并入新成立的真主党。“海湾君主国政治什叶派的第一批宣传者是同情伊拉克达瓦党思想的宗教学生。”^①达瓦党传入沙特、巴林和科威特后,也直接推动了当地什叶派的政治发展。

表1 当代阿拉伯国家(除伊拉克)重要什叶派乌里玛在纳杰夫生活和学习情况

国籍	姓名	出生年	停留时间段	时长	备注
黎巴嫩	穆萨·萨德尔	1928年	1954~1958年	4年	
	侯赛因·法德拉拉	1935年	1935~1966年	31年	
	马赫迪·沙姆斯丁	1936年	1936~1969年	33年	
	苏步希·图费利	1948年	1970~1979年	9年	真主党第一任总书记
	阿巴斯·穆萨维	1952年	1970~1978年	8年	真主党第二任总书记
	哈桑·纳斯鲁拉	1960年	1976~1978年	2年	真主党现任总书记
沙特	哈桑·萨法尔	1958年	1971~1973年	2年	
巴林	伊萨·卡赛姆	1937年	1962~1966年 1968~1972年	8年	
	埃米尔·贾姆利	1938年	1962~1973年	11年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维基百科信息汇集而成。

(二) 设拉子派

设拉子派的出现是卡尔巴拉、纳杰夫以及不同乌里玛家族之间竞争的结果。设拉子派是穆罕默德·设拉子及其家族追随者的泛称。穆罕默德·设拉子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乌里玛家族,该家族19世纪从伊朗的设拉子移居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家族成员包括1891年颁布禁止消费烟草法特瓦的大阿亚图拉米尔扎·哈桑·设拉子和领导1920年伊拉克反英起义的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塔基·设拉子。穆罕默德·设拉子的父亲马赫迪·设拉子(1884~1961)生于卡尔巴拉,在纳杰夫完成宗教教育后,于20世纪30年代返回家乡,在当地开设宗教学校。他的4个儿子(穆罕默德、哈桑^②、萨迪克和穆基塔巴)都在这所学校接受教育,并成为宗教学者。1961年马赫迪·设拉子去世后,其长子穆罕默德·设拉子接管宗教学校,并宣布自己为

^① Laurence Louer,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olutionary Utopias in the Gulf Monarchies," in Sabrina Mervin, ed., *The Shi'as World and Iran*, Bart Peeters, trans., London: Saqi Books, 2010, p. 64.

^② 1980年,哈桑·设拉子在贝鲁特被伊拉克政府秘密杀害。

“效仿源泉”但其地位并未得到纳杰夫宗教界的承认。尽管如此,穆罕默德·设拉子利用家族声望,与卡尔巴拉的重要家族结盟,成功使自己成为这一圣城的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设拉子的妹妹与穆达利希家族(来自伊朗北部马什哈德)的一名宗教学者结婚,生育了 4 个儿子。其中,塔基·穆达利希(1945 年生)和哈迪·穆达利希(1946 年生)在设拉子派政治组织的扩张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①

设拉子派与纳杰夫之间的竞争遍及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设拉子派认为乌里玛介入政治是一种义务,^②但是当纳杰夫乌里玛在达瓦党初创时期联系设拉子派时,他们却拒绝参与其中,不愿在达瓦党中扮演次要角色。设拉子派遂将达瓦党的势力驱赶出了卡尔巴拉,^③决心发起独立于纳杰夫的什叶派运动。1968 年,设拉子派创建了“先锋宣教者运动”(Movement of Vanguard's Missionaries),以卡尔巴拉为中心开展活动。很快,设拉子派遭到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镇压。1969 年,穆罕默德·设拉子的弟弟哈桑·设拉子逃离伊拉克,先后前往黎巴嫩和叙利亚。穆罕默德·设拉子与家族大部分成员以及外甥塔基·穆达利希和哈迪·穆达利希也离开伊拉克,最终在 1971 年抵达科威特。就此,设拉子派的活动中心经历重大转移。设拉子派在发源地伊拉克被边缘化,但却成为海湾君主国什叶派运动的主导性因素。

在科威特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设拉子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穆罕默德·设拉子一方面与科威特王室建立良好关系,一方面在当地积极扩大影响。在科威特的 9 年时间里,穆罕默德·设拉子最重要的活动便是建立了至圣经学院(Hawza of the Supreme Prophet)^④。当 20 世纪 70 年代纳杰夫和库姆的经学院难以正常教学时,海湾阿拉伯君主国的什叶派穆斯林不仅在这里完成了宗教教育,还接受了政治思想的培训,尤其是沙特和巴林的学生回到本国后,迅速成长为当地什叶派政治运动的骨干。穆罕默德·设拉子还委派外甥哈迪·穆达拉斯到巴林活动。“先锋宣教者运动”逐渐成为具有跨国影响的地区性什叶派政治力量和“那个时代最庞大的什叶派伊斯兰运动”^⑤。正如纳杰夫曾是什叶派世界思想变革的中心一样,科威特的至圣经学院是 20 世纪 70 年代海湾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培训基地。设拉子派培养了一代乌里玛出身的政治精英,对海湾君主国什叶派政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沙特,设拉子派的影响远在纳杰夫之上。

① Laurence Louer, *Transnational Shia Politics: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Networks in the Gulf*, p. 93.

② 设拉子派的政治思想接近于霍梅尼的思想。穆罕默德·设拉子是 1965 年唯一在霍梅尼抵达伊拉克时举行欢迎仪式的穆智台希德(伊斯兰教法权威学者)。

③ Faleh A. Jabar, *The Shi'ite Movement in Iraq*, London: Saqi Books, 2003, p. 104.

④ Laurence Louer, *Transnational Shia Politics: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Networks in the Gulf*, p. 121

⑤ “Saudi Shi'ites: New Light on an Old Divide,” October 26, 2006, http://www.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HJ26Ak02.html, 登录日期:2014 年 2 月 7 日。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穆罕默德·设拉子与家族多数成员来到库姆,在当地建立宗教学校,其三弟穆基塔巴·设拉子(1943年生)则前往伦敦开展活动。1996年,穆罕默德·设拉子之子穆尔塔达(Murtada)到美国华盛顿建立了伊玛目设拉子世界基金会,设拉子派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设拉子派与伊朗统治精英关系密切,并在伊朗向阿拉伯国家什叶派输出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2001年穆罕默德·设拉子逝世后,他的二弟萨迪克·设拉子(1942年生)继承他成为“效仿源泉”。穆罕默德·设拉子的6个儿子和穆基塔巴·设拉子4个儿子都遵循家族传统成为乌里玛,并在设拉子派的国际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②

四、当代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化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化成为普遍现象。阿拉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国内局势的变化令乌里玛无法置身于政治之外。即便是被视为政治无为主义代表的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在伊拉克战争后也屡屡干预政治,对伊拉克什叶派的政治活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阿拉伯什叶派高度政治化的情况下,自视为伊玛目世间代表的乌里玛不得不关注现实问题,表达穆斯林大众的政治意愿。当前,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面临的早已不是要不要参与政治的问题,而是以何种形式发挥政治作用、施加政治影响的问题。总的来看,乌里玛政治化是当代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乌里玛确立了对什叶派的领导权,改变了什叶派内部的权力结构。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乌里玛在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二战后现代化浪潮的兴起对什叶派传统政治精英造成致命打击,内外因素的作用导致大地主、部落酋长等急速衰落,乌里玛确立了在什叶派政治中的核心地位。相比其他阶层,乌里玛参与政治具有多种优势。乌里玛与民众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密联系,宗教是乌里玛最便捷有效的动员手段,什叶派的效仿制度则确保乌里玛能够发挥更强的号召力。乌里玛实现政治化后,迅速取代了传统贵族的地位,成为什叶派的重要政治代表。阿迈勒运动主席纳比赫·贝里和达瓦党总书记马利基(伊拉克前总理)等中产阶级出身的世俗政治家虽声名显赫,但远不足以对乌里玛构成根本威胁。在黎巴嫩,穆萨·萨德尔在1978年消失前是无可争议的什叶派政治领导人,侯赛因·法德拉拉在其之后也深刻影响着国内政治,乌里玛还支配着阿拉伯什叶派最大的政治军事组

^① Laurence Louer, *Transnational Shia Politics: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Networks in the Gulf*, pp. 177-182.

^② Ibid., p. 93.

织——真主党。在伊拉克,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是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的灵魂,1980年遭复兴党杀害,萨迪克·萨德尔也因挑战萨达姆权威在1999年遇害。2003年以来,西斯塔尼在伊拉克什叶派中享有任何人都难以匹敌的影响力,穆克塔达·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动成为什叶派中最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在巴林、沙特和科威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什叶派领导人几乎都是乌里玛。虽然绝大多数声名显赫的乌里玛都没有在政府任职,但他们却对政府和国内政治有重要影响。显然,乌里玛的政治崛起使阿拉伯什叶派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竞争中,他们确立了自身不可撼动的地位。

其次,乌里玛政治化激发了什叶派的政治能量,提高了该群体的政治地位。乌里玛政治化是阿拉伯什叶派普遍政治化的重要前提和关键因素。数个世纪以来,阿拉伯什叶派因人数处于绝对劣势,难以在政治上发挥影响。20世纪60年以来,乌里玛运用宗教动员群众,唤醒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将无数什叶派纳入政治进程,增强了其凝聚力和组织性,进而使他们成为敢于争取自身权益的政治主体。就动员的有效性而言,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世俗民族主义者,都无法与乌里玛相提并论。相较于过去,如今阿拉伯各国什叶派的政治地位普遍得到提高。其中,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地位的提高最为明显,该派已成为黎巴嫩国内的强势教派,乌里玛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伊拉克,乌里玛的领导令什叶派对复兴党政权构成巨大挑战。2003年以后,西斯塔尼、穆克塔达·萨德尔以及哈基姆家族领导下的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①令什叶派在伊拉克战后的政治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最后,乌里玛政治化强化了什叶派政治运动的教派特征。二战前后,加入共产党和复兴党等跨教派政党是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但在乌里玛政治化后,什叶派政治运动呈现出鲜明的教派特征。什叶派乌里玛往往倡导教派合作,但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客观结果却是什叶派与其他教派之间隔阂的加深。一方面,乌里玛的领导地位令其他教派难以接受与什叶派同处一个组织或阵线。在其他教派人士看来,什叶派乌里玛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领导下的政治运动只能追逐狭隘的教派利益。另一方面,乌里玛阐述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浓厚的什叶派色彩,比如“法基赫的监护”思想对于逊尼派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内容。此外,乌里玛还利用卡尔巴拉惨案和阿舒拉节等什叶派特有的历史事件和宗教节日来动员民众。穆萨·萨德尔要求黎巴嫩什叶派学习伊玛目侯赛因不畏牺牲的精神,阿舒拉节的宗教活动曾多次演变为反政府活动。从参与主体来看,乌里玛领导的政治运动只能局限于什叶派。当然,什叶派本身的处境也使得乌里玛有意维护本教派的利益,这在黎

^① 1982年,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Supreme Assembly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建立,2007年改名为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Islamic Supreme Council of Iraq)。

巴嫩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穆萨·萨德尔曾旗帜鲜明地发起什叶派运动,将提高什叶派的地位作为最高目标。

五、余 论

总的来看,乌里玛对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产生了全面且深刻的影响。乌里玛的政治角色是该阶层充分发挥自我优势的结果,也是他们不断自我调整、追求变革的产物。许多学者认为,现代化和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甚至摧毁传统的权威结构。但正如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等阿拉伯什叶派学者所表明的那样,社会的迅速变革不仅没有淘汰乌里玛,反而赋予了他们新的活力。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的力量不仅来自其宗教身份和所拥有的宗教知识,而且来自于他们与人民为伍的高度自觉和社会适应能力。为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他们开始利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现代传媒和手段进行政治动员,其身份也从宗教指导的传统知识精英逐渐转向政治精英,并且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影响。

2010年底以来的中东剧变对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构成了新的挑战,他们依据所在国的形势,对中东剧变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在黎巴嫩,纳斯鲁拉为支持巴沙尔政权,选择让真主党参与叙利亚内战;在伊拉克,西斯塔尼多次督促政府惩治腐败和改善民生,穆克塔达则多次发起大规模集会,要求政府进行改革^①;在沙特,宗教学者尼米尔·尼米尔(Nimr al-Nimr)因领导2011年什叶派抗议运动而被政府逮捕处死;在巴林,伊萨·卡赛姆等乌里玛广泛参与青年抗议运动。事实表明,什叶派乌里玛依然活跃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舞台。中东局势的混乱,地区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民众生活的艰难,促使他们走出清真寺发起政治运动。阿拉伯什叶派中至今也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替代乌里玛的地位。因此,乌里玛的政治参与仍将是阿拉伯什叶派的一个长期现象。

(责任编辑:包澄章)

^① Ibrahim Al-Marashi, "Iraq: The reinvention of Muqtada al-Sadr," Al Jazeera, March 9, 2016,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6/03/iraq-reinvention-muqtada-al-sadr-160309061939234.html>, 登录时间:2016年3月22日。

Abstracts

03 On the Politicization of Contemporary Arab Shia Ulama

Abstract The politicization of Arab Shia Ulama has undergone a gradual process of evolution.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 Shia Ulama in the Middle East showed unprecedented political enthusiasm.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impacted by secularization, the survival crisis of Ulama and the growing of sectarian political crisis, Shia Ulama began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Two Iraqi Shia holy cities, Najaf and Karbala, are bases of their politicization. Through “Najaf Network” and Shirazyin, the politicization of Arab Shia Ulama has been achieved, which has also exerted multiple influences.

Key Words Arab Shias; Ulama; Politicization; “Najaf Network”; Shirazyin

Author LI Fuqan,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16 Political Islamic Movement and the Nation-State Rebuilding in Yemen

Abstract Along with its nation-state building process, Yemeni political Islamic movement has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the dissident of regime to a political participant. Political Islamic movement in Yemen has increasingly shown diversific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movements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resent-day Yemeni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Despite the current political crisis in Yemen continued, coupl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adical political Islamic movement represented by Houthi Forces, Yemen's experiences of stability maintaining show that the “Inclusion — Moderation” model still ha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future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and social transition in Yemen.

Key Words Political Islamic Movement; Yemen;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Inclusion-Moderation Hypothesis

Author SU Ying, Lecturer, College of the Politics and Law, Shihezi University, Ph. D. Candidate, Middle East Institut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HUANG Minxing, Professor,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31 Political Islam vs. Secular Political Parties: The Case of Muslim Brotherhood

Abstract Political Islam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in Islam world,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al syste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Islam and secular political parties exerts great influence in shaping interior politics in Middle East countries. Taking Egypt as an example, Muslim Brotherhood (MB) and other political Islam are very prevalent. Although there exists some cooperation between MB and Egyptian secular political parties, rivalry is still the mainstream relationship of them. The situations result from three factors below: First, it originates from the difference of two thoughts, namely secularism and Islamic Revivalism, which have absolute contrary ideas of how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of a state, and the gap could barely be removed. Second, although MB has the will to ac-